

太平天国时期鄂西北红巾军起义

萧 致 治

鄂西北红巾军起义是太平天国时期湖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。这次起义是在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影响下,鄂西北地区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一次激烈阶级斗争。这支起义军在襄阳起义后,先后攻克鄂西北、豫西南、鄂西南等地10多座城镇,队伍号称10万,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。起义军在斗争过程中消灭了大批地主武装,摧毁了大量设于鄂西北等地的清政府统治机构,开仓济贫,把储存在各地的粮食分给贫苦饥民,沉重地打击了鄂西北地区的封建统治,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反清斗争作了有力的声援。

鄂西北红巾军起义(1856—1857)是太平天国时期湖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。起义军头裹红巾,北起南阳,南到宜昌,东抵枣阳,西达竹溪,战斗于鄂西北和豫西南的广大地区,先后攻克了樊城、邓州、光化、老河口、谷城、房县、竹山、保康、兴山、宜昌、远安、荆门、内乡、武安堰等10多座城镇。义旗所至,群众热烈响应,队伍“号十万众”^①。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,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。

对于这次起义,笔者曾于1974年带领一个教学实践队和襄阳牛首高中教育革命组结合,重点调查了襄阳县、襄樊市以及光化、谷城、均县、南漳、保康等7个县市,先后召开了158个调查会,访问老人647人次,发现有关碑记3块,文物4件。1976年7—8月,笔者又和牛首高中卓坤老师等冒着酷暑,到襄阳、邓县、光化、均县武当山等地进行复查,又发现不少新资料,并将调查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分类整理,编成《太平天国时期鄂西北红巾军起义资料汇编》,但一直未写成论文发表。现特整理成文,以飨读者。

一、起义时期的鄂西北

历代农民起义,都是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结果。鄂西北这次起义,固然受到太平天国和捻军大起义的影响,究其根本原因,仍然在于农民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,为了争取生存权利,才被迫奋起反抗的。

这次起义虽然发生在鸦片战争后10多年,由于鄂西北地处中国腹地,西方资本主义当时对这一地区的影响还很小,所以这次起义仍然是一次旧式农民反封建斗争。土地问题仍然是斗争的核心。

在鄂西北,从调查的情况看,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,仍然是个突出问题。当时的襄阳,有一个顺口溜:“一刘二胡三段家,王廷献算第四家,朱家号不算个啥”^②。这里的“刘”是指襄阳东津大旺洲刘荣德。他是襄阳县的首富,号称“刘百万”,家里有地14000多亩。大旺洲还有一个刘耀坤,有地9985亩。两家共计占地两万多亩。泥咀附近胡家外号“胡老奸”,有将近2万亩地。王廷献有地9970亩,因为有1万亩要称“员外”,怕露富,才没有继续买。还有“不算个啥”的朱家号名叫朱紫登,当过清朝的运粮官。群众反映,朱家田地只差8亩就是一万亩。另外,襄阳城内也住着一些有财有势的大地主。最著名的要数黄百万,原籍宜城,他家土地遍及襄阳、宜城、南漳、谷城等县,是襄阳府最大的地主,总计有地2万多亩。而权势最显赫的则是单家。单懋谦于1832年考中进士,从1837年起入直南书房。太平军进入湖北时,因母死居家,奉命在籍办团练。他是当时襄阳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,家中合计有9000多亩地。单懋谦后来官至文渊阁大学士,兼管兵部^③。家住襄阳西边竹条铺的贵家,有地5000亩。竹条东北的卓家营,有7家大地主,据说每家有地7000亩。还有南王八大家,是著名的老地主。八大家共有良田12000多亩,房屋300多间,粮仓157座,南王周围几十个营子的人家,几乎都是八大家的佃户。……此外,还在樊城、李食店等地开设有粮行、花行、粉坊、油坊、京广货店、大酱园、鸦片烟馆和赌场等,在南王地主庄园周围还建有三层楼高的炮楼7座^④。

一方面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,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土地。红巾军开初酝酿起义的地点,几乎都是租种地主土地的穷村庄。起义的领袖之一冯三典,家里好几辈都没有地,老家冯马家,是个穷营子,据营子祖师殿的碑上记载,全营子当时共有83户人家,全部给人家赶工种地,营子周围都是人强势大的大姓,冯马家经常受邻村大地主的欺压。相传有个歌谣曰:

前门是黄山洼,后门是五户薛家,东边是六合陶家,

西边是三王家,冯马家是个穷疙瘩^⑤。

起义军另一领袖高二先的家老范冈,“九里十八姓,是个穷而杂的村庄,经常受上下张家地主的欺压,每到割麦季节,上下张家常常把老范冈人种的麦子割的割、挑的挑、抢走,老范冈人不敢去阻拦。”^⑥和冯三典、高二先最早伙同策划起义的范二娃,本名范正昌,家住河里范家。他家里无田无地,常年给人家帮工。马集附近的李冲、张岗一带,参加起义的人很多,这些村庄的人都是种黄山洼地主和吴家楼地主的地。据段学谦等说,他们营子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很多,直到解放后土改时,全营子70多户中,只有两户地主和两户富农^⑦。

在封建社会里,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地主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,主要就是凭借土地来欺压农民,迫使他们当牛做马。农民为了维生,不得不忍受地主的苛刻条件,租种地主的土地耕种,或者替他们当雇工。在襄阳,租种地主的地,一般先要缴一笔押金,名曰“顶手”钱。如果以后不交租或租未交足,就扣押金。在当时,地租一般对半分,也有高达6成7成的。地主还经常乘农民的穷困,迫使农民高利借贷。青黄不接时借一斗小麦,麦收后要还一斗二、一斗三、一斗五。朱家号借粮给穷人用小斗,今年借了他一斗高粱,明年要还一斗小麦^⑧。

田赋尽管名义上出自自有田地的人家,实际上不少失去土地的人仍在完纳钱粮。有的土地“已更易数主,变卖已经数世,而粮名未换,仍在旧户下完纳者,而官与粮书皆昏然不知。始意不过欲隐匿税契耳,久之而飞洒诡寄之弊生矣,久之而私收欺侵之弊作矣。”^⑨这样,有些人几代以来已无立锥之地,却仍然要缴纳田赋,而且已成为很普遍现象。据《襄阳府志》记载:“地去粮存者居什之三,而贫役富免者居什之七。”^⑩许多农民本来已经穷困到无法维生,在忍受残酷的地租高利贷剥削的同时,却在失地的情况下,仍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和服繁重徭役。此外苛捐杂税也是无奇不有。“家里养只母鸡,每月派两个鸡蛋。你如不交,他们听到鸡叫就来收。砍一

根树梁去卖,也要收税。人们实在活不下去了,才跟张瞎子(即张维邦)造反”^⑩。

广大农民在忍受残酷经济剥削的同时,还经常受到胥吏差役、豪强劣绅的敲诈欺压。道光咸丰年间,清朝吏治已经腐败到了极点。胡林翼承认:“今日之吏治,无一事不思夺民。衙门丁胥差役,无一人不思朘民”^⑪。在鄂西北一带,吏治腐败、豪绅横行的情况更加突出。据调查,这支起义军起义后的斗争矛头,首先就是指向强夺民地的恶霸地主徐进朝。对于襄阳、郧阳地区吏治的腐败情况,当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在奏报和批牍中曾经多次提到。他说:“襄阳差役,实为通省之冠,来示西乡蠹役张绍荣依势吓诈,鱼肉乡里,应不动声色,设法密捕。……至此外姓名,不能记忆,惟知差役之穷凶极恶以襄阳为最耳。”^⑫又云:“襄郧一带,吏胥之肆毒,甚于虎狼。此辈积病太深,非痛下针砭,不能除其沉痾,而民间之颠连疾苦,亦断不能呼号毕达。以有尽之脂膏,其何堪此日朘月削之有加无已耶!”^⑬镇压这次起义的刽子手唐训方也承认:“光化旧多盗,书役豢之。每河口行劫,虽白日左右邻无敢救者。报官,官侦贼远始出验。事主求办贼,则串攀良民,真盗仍为包庇。”^⑭这些出自官吏之口的记载,自然不会夸大,只会缩小。可想而知,广大人民长期处于这种惨重压迫剥削之下,积愤于心,怨愤所至,终有一天会爆发成反抗怒火的。鄂西北红巾军起义正是这种怒火的大爆发。

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,已使农民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,一遇水旱天灾,农业失收,广大农民更无法生活下去,除了造反,别无出路。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发生在灾荒之年,原因即在于此。鄂西北红巾军起义也正是这样。咸丰六年,即红巾军起义之年,在鄂西北是少有的大旱之年,许多地区不仅颗粒无收,而且“滴水贵如油”,连饮水也很困难。据当地老人说:“咸丰六年七个月无雨,年成极坏。”有关这年的旱情,文献中亦有很多记载。《宜城县志》称:“(咸丰)六年,自五月不雨,至于九月,陂塘泉堰皆涸,首种不入。七年春大饥,斗米千钱。”《续辑均州志》载:“咸丰六年丙辰,夏旱无禾,岁大饥。”《光化县志》说:“六年丙辰蝗,七年丁巳饥,斗米千钱。”《房县志》载:“六年六月……谷城、均州、郧县歉收,逃荒来者络绎不绝,谷价骤涨2400文。”胡林翼在《查勘襄阳、德安府属灾歉情形……疏》等中也指出:“湖北各属,咸丰六年,自夏徂秋,旱干日久,受旱情形,襄阳、德安、安陆三府为首重。”“成灾之区,颗粒无收,困苦异常。”^⑮严重的灾荒,促使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,鄂西北红巾军起义就在这年秋天正式爆发了。

二、竹条起义 克樊城 围襄阳

鄂西北红巾军起义爆发于咸丰六年丙辰八月二十八日(1856年9月26日)。起义前,曾经有过一个酝酿和积聚力量的过程。

这次起义是以传播灯花教为形式发动起来的。传教人朱中立(一作中瑞),安陆人,早在起义10年前,就到襄阳一带从事传教活动,曾受到清政府的通缉。这年三月,他再次来到襄阳,以拜灯花为名,在竹条等地向群众进行串联发动,声言初一、十五点神灯、念经、拜灯花,可以把很小的灯花拜成很大一团火,还可骑着板凳、扫帚当马,夹个团窝能飞往南京。他们四处联络,把贫苦农民组织在灯花教中,其中起骨干作用的有高二先、范二娃、冯三典、王喜、马光先、张瞎子(名维邦)、喻家俭、庞大兴、张所宽、王士旺、李凤先等人。据《襄阳县志》记载:“六年三月,安陆人朱中立潜匿襄之竹条铺,与教匪王喜、马光先等挟妖术,暗招亡命。盐泉冯三典伪称将军,范二娃称元帅,高二先伪称都督,密推中立为王。”^⑯胡林翼在奏报中称,朱中立“倡言赤龙主岁(丙为火,辰为龙,故云),应兵祸,距嘉庆教匪周甲,湖北当再乱。二先等惑其议,遂潜赴西北境,勾结无赖子弟数百人,秋八月起事竹条铺。”^⑰竹条八月起义带有必然性,也有偶然因素。据朱

中立被俘后供认,起义原定农历九月十九日。八月正在竹条铺鄢子茶馆楼上请了裁缝赶做起义旗帜。一天,有个名叫古子三爷的流棍闯上楼来,偷了几面旗子跑了。朱中立等人耽心事情因此败露,乃决计改于八月二十八日提前起义。他们宣布起义后,首先跑到竹条董奎盛百货店,将店里320匹红布全部买了,撕成小块。凡是参加起义的,每人头上包一块红布作为标记。因此,人们称为红巾军。据老人讲,开初竖旗起义时只有18人,“竖旗以后,他们打了副爷衙门(指竹条巡检署),走出竹条,参加的人已有七十多。到了范许家巷,已有三四百人。走到堰口,已有一千多人。到了溜子集(龙王集),已有一万多人。”^⑧这些数字不一定准确,但足以表明起义后一呼百应,队伍发展是相当迅速的。关于竹条起义,《襄阳府志》记载说:“六年九月,襄阳红巾贼起。是年三月,安陆人朱中立潜匿襄阳竹条铺,……于八月二十八日夜烧竹条铺,剽掠北乡,时贼众仅数十人。”^⑨这段记载如去掉诬蔑之词,基本情况和我们的实地调查,大体是相符的。

红巾军在竹条起义后,除打了守卫竹条的清兵驻地外,还杀了作恶多端、强夺别人田地的徐进朝,然后在龙王集一带集结队伍,于九月初三日由龙王集到达牛首,继续向樊城进兵。当起义队伍到达竹条以东的兴隆镇时,正碰上襄阳知府海顺督率清军1万多人前来进剿。清军在大雾中只见起义军红旗如林,心惊胆颤,一触即溃。红巾军乘胜追击,1万多清军如鸟兽散,海顺“仅以身免”^⑩。起义军在当天晚上即占领了樊城(几天后复行撤出)。随后,起义军在襄樊周围得到迅速发展,北至鄂豫交界的魏家集,东到峪山,南到宜城,西到泥嘴,都成了起义军的天下,“旬日间众至六千人。”^⑪九月十七日(10月15日),清军都司卢占春统带精锐营千人到达樊城,为起义军侦知。高二先等决定先发制人,于当天夜里向樊城突然袭击,将精锐营一举歼灭,仅守备朱长春、把总张殿甲等数十人游过汉水,得免一死。起义军再次胜利占领樊城。

红巾军在攻克樊城及占领周围的过程中,纪律严明,“不戕百姓,不烧房屋,不奸子女”^⑫,而且“劫富济贫”,深得广大群众拥护。不幸的是,在向樊城进军的过程中,朱中立因为迷路被地主团练拿获遇害,马光先亦为团勇所杀,致使起义的领导核心受到重大损失。

红巾军占领樊城后,随即从白家湾过河,于九月二十三日向襄阳城发起进攻。由于襄阳城墙高厚,护城濠又灌满了水,“濠深莫渡”,只得退了下來。起义军感到要攻克濠深城高的襄阳府,必须有长大的云梯才能奏效。谷城红巾军首领张维邦想到光化城内的杪楞树,只有砍倒杪楞树,才能攻克襄阳府。于是带领一支红巾军于十月十一日攻克光化,并砍倒大数十围的杪楞树,准备做成云梯运往襄阳,再行攻城(后已运到泥咀,在泥咀之战中被清军缴获)。随后,张维邦带领的红巾军又攻下老河口和谷城(十月十七日)。另一支红巾军则北进河南,于十月初七攻克邓州。南阳瓦店丁官营人邓大公与红巾军早有联系,得知红巾军进入河南,立刻在瓦店起兵响应,拥众千余人。不久,随州赵邦璧也起兵大洪山,并于十一月十一日攻克随州城,二十日攻入安陆府。红巾军攻城夺地,所向披靡,声势大振,起义队伍很快扩大到数万人。

三、大军西进 克房保 下竹山

鄂西北红巾军起义的胜利发展,引起了清朝当局的极大震惊。当时太平军占据武昌已一年多,清军奋力反扑,屡遭失败。北方的捻军在豫东横冲直闯,清军正穷于应付。现在又有红巾军起义鄂西北,他们更感到万分恐惧。咸丰帝把红巾军起义视为“心腹之患”,十分害怕形成燎原之势,无法收拾,谕令湖广总督官文、湖北巡抚胡林翼、河南巡抚英桂即日调派兵勇,“星夜前往”,会同剿捕,“务绝根株”^⑬。

在咸丰帝的严令下,胡林翼派知府唐训方率领劲兵1200名,以日行80里的速度驰往,又

令舒保率领马队 200 名前往相助；荆州将军也派遣署松潘镇总兵德恩率川军由宜城北进，还派遣讷依阿率马队前往，又有富隆武的炮船 8 只、水师划船 60 只亦随往助剿。此外，随同盐法道常恩进剿的还有天津兵张由庚部、荆州副都统富森部、扎勒罕部、都司咸恒部。河南巡抚英桂则命令南阳镇总兵邱联恩率兵 2000 多名南下堵御；署陕西巡抚谭廷襄亦派遣延绥镇总兵龙泽厚带兵 2000 名配合邱联恩会剿。至于分散在各地的团练，则早已纷起与红巾军为敌。清军从四面八方扑来，红巾军四面受敌，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。

首先是德恩率领的军队率先进入襄阳南境，和常恩所率军汇合，继九月二十七日攻占宜城小河后，又于第二天攻占欧家庙，逼近襄阳。十月初七日（11 月 4 日），唐训方亦率部经枣阳到达襄东，会合舒保的马队向峪山发动进攻。红巾军在峪山驻军不多，经过一番激战后撤走。唐训方乘胜率部在襄阳以南 10 里的蔡洲渡过汉水到达襄阳城下。常恩和唐训方这两支清军汇合后，随即向襄阳以西推进，十月十一日与红巾军激战于汉水之南的万山、泥咀等地。红巾军因受到两路夹击，被迫渡过汉水，退到襄阳西北一带坚持斗争。十月十三日，清军渡过汉水进攻樊城。此时红巾军主力已集中到了襄北，樊城驻军 2000 人略有交锋，随即退走^⑧。在此后的 20 多天里，清军与红巾军在襄北的红绫铺、吕堰驿、桐树店、薛家集、清河店、龙王集、白家集、卓家营、北泰山庙、杨家集以及邓州七里河等地反复进行了激烈的交锋，双方互有胜负。无奈红巾军尽管人多势众，士气高昂，终因未经训练，大多数不习战阵，装备又差，在历次战斗中伤亡很大。红巾军领导乃决计进行战略转移，挥师西向，进军房县、保康。驻守邓州的红巾军，经过十一月初七、初八与邱联恩部的两天激战，亦于初八日突围撤走。

正当红巾军主力在襄北继续与清军激战之际，红巾军张维邦部已开始向郧阳府转移。十一月初二，张维邦率部抵达均州以南的草店。均州知州吴嗣仲督率兵勇一千多人前来迎击。初三，双方在闽兵营发生遭遇战。张维邦派一部分红巾军抄到清军后路，前后夹击，清军大败。张维邦乘胜进兵均州城。由于缺乏攻坚武器，经过一夜的战斗后仍旧退回草店驻扎。十日，署郧阳镇总兵阿昌阿督率兵勇前来进攻，双方在花栗树展开激战，红巾军又大败清兵。

红巾军主力在十月初八与清军在襄北杨家集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后，即于第 2 天撤出襄北，向光化转移。十八日，主力约 2 万人由沙陀营（即丹江口）渡过汉水，与张维邦的先头部队汇合，于二十日再度向均州城发起进攻。经过 4 昼夜的战斗，仍旧因缺乏攻坚手段，未能得手，不得不放弃攻城计划。这时，清军已尾随而来，德恩部扎营于离草店 20 里之丁家营。红巾军中了敌人诱之深入的奸计，前往迎战，失败而归。二十五日，红巾军数万人开始由官山河等地分三路涌入房县，“致房县、保康、竹山等处如秋风败叶，愈扫愈多。”^⑨

房县知县金玉堂得悉红巾军大举入房，即刻带领兵勇防堵。当金领军到达北乡东浪，红巾军已“沿山遍野”压来。金玉堂督军迎战，大败而逃。红巾军乘胜进军，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举占领房县县城。

红巾军占领房县后，稍事休整，除留部分军队驻守房县外，随即兵分两路：一路西上竹山，一路东下保康。十二月初十，西上的红巾军到达竹山县城郊，竹山县知县汤一德列阵于竹山城东门外河边防御，发炮轰击红巾军。红巾军得到探报，知道城南空虚，乃避开正面作战，绕道由南面渡河，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攻入了竹山城。东下保康的红巾军在张维邦的率领下，于十二月十一日到达保康县属的堰塘。知县方兆科、守备熊运泰率兵御之于城西银溪沟。红巾军退到呜呼垭扎营，积极作攻城准备。十四日早晨，红巾军不声不响绕到城北，经铁佛寺直入保康城。红巾军在半月内连下三城，声势再次为之一振。

四、北路军东征西战 南路军直下荆宜

红巾军进入房保地区不久，清军常恩、舒保、德恩等均相继尾随入山，陕西绥德镇总兵龙泽厚也率兵由陕西进入竹山。红巾军面对清军的前堵后追，于咸丰七年正月初会师于保康西南之歌马河，商议对策与下一步行动计划。随后，红巾军分成南北两路：南路军由张维邦率领向兴山、宜昌进军，北路军高二先等仍在保康、房县、南漳等地坚持战斗。

北路军在高二先等人的率领下，挥师北进，在蒋口、寺坪、黄连树垭、虫蚁垭等地连续与清军发生战斗，尤以保康金斗坪一战，争夺最为惨烈。正月十五（1857年2月9日），先是观音岩、分水岭两路兵勇向红巾军发动进攻。紧接着，常恩亦率军投入战斗，德恩也率军从房县赶来会剿。红巾军在各路清军的围攻下，伤亡达千多人，冯三典在战斗中牺牲，范二娃投降后仍然被杀。高二先见势不妙，率领1千多义军乘黑夜突出重围，向房县方向退却。十七日，与房县守军战于教场，杀死生员陈正烈、练勇杨春林等多人。十九日，又在南乡小河口与守军发生战斗，杀死勇首、生员张映华、车世聪等人，然后率师东进，转战于南漳、远安、荆门一带，受到唐协和、舒保等人的尾追堵截，并在栗溪、倒座庙等战斗中一再受挫，无法立足，只得回师北上，在均州黄家湾、黄远坪等处渡过汉水，连败板桥河、石鼓关、康柳一带的地方武装，进入河南淅川、内乡境内。内乡知县杨镛率领团练抵御，红巾军乘机打败这支清军，二月十七日，胜利攻克内乡县城。

南路军在张维邦率领下于正月初七南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兴山县城，全城文武官员乘着黑夜弃城逃走。红巾军在兴山县城驻扎三天，随即挥师东进，连败雾渡河、朱家咀、多子桥、夜明珠等地守军，于正月十七日与宜昌城内变兵刘尚义等里应外合，攻克宜昌府城。二十七日，又以突袭方式攻下远安。二月初六，红巾军由远安继续东进，胜利攻克了荆门直隶州。一月之内，南路军连克兴山、宜昌、远安、荆门4城，真可谓长驱直入，势如破竹。

五、红巾军的失败

红巾军南路连克宜昌等四城，声势颇大。湖北巡抚胡林翼顾虑派往襄阳等地的清军难于南北兼顾，又增调副都统巴扬阿率领候补知府孙振铨所统之义营、益阳学邹汉章统带之新宝营日夜兼程，赶往荆门追剿。南路军占领荆门后曾试图向南发动进攻，受到清军胡举高、邹汉章两部的阻击，退回州城后又受到清军的围困，乃于二月初九突围北上。

二月十二日，南路军进驻南漳武安堰。唐训方闻讯，急率清军前来堵截。他深恐红巾军再次入山，即于十四日驰驻九仙观附近的火神庙防堵。红巾军乘唐军初至，营垒未就，即分三路前去进攻。唐训方开初按兵不动，待红巾军士气渐衰，命令清军分三路迎击。刚一交锋，红巾军即乱了阵脚，往回奔逃。十五日，唐训方移营得胜坡（距武安堰8里），正在筑垒之际，红巾军出动七八千人迎战。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交锋，相持达四五小时，因天色已晚，双方始行收兵。十七日双方在武安堰城外又发生了激烈的交战。唐训方的坐骑被红巾军炮子击中，险些丧命。可是，因为红巾军不习马战，马步混杂，自相惊扰，反为敌人所乘。红巾军只得退居武安堰城内固守。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，巴扬阿所率援兵先后赶到，把武安堰团团包围。巴扬阿剿抚兼施，引诱张维邦投降。张维邦在屡战失利之后，丧失了信心，于二十三日率众投诚，改名“张兴邦”。唐训方不赞成巴扬阿的招降计划，主张武力剿灭，曾条陈招抚非计。胡林翼从中调停，致函唐训方退兵，移营襄北，负责追剿高二先所率北路军。

北路军占领内乡后，知府何怀珍等率领兵勇会合杨镛发动反击，高二先率军退出县城，与总兵邱联恩的回援军相遇于李官桥，红巾军伏兵四起，将邱联恩军重重包围，杀得邱联恩“壶矢皆竭，血冰刀环间累寸许”^⑧。高二先收兵后于当晚回到襄北，隐伏于黑龙集、张家集一带。

三月初四，清军侦悉高二先隐匿于张家集，乃与舒保商定马步分兵围剿之策。初五（3月30日）天下大雪，清军乘雪夜行，“唐协和率副训营剿贼之西，邹汉章率宝营、孙振铨率义营剿贼之东，舒保、讷依阿率马队剿贼之北，唐训方率正训营自南迎击，而以五品衔生员吴佑棠率其募勇伏马家集，密约初六日午刻四面围剿”^⑨。高二先等见被敌人包围，乃率先主动出击。无奈兵少力弱，左冲右突，均被堵回。最后，高二先率领数十人才乘天黑浮水西走，至初七日天明，终被清军在郭家冈擒获。同时被擒的还有张文质、张所宽等人。至此，红巾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了。

两支红巾军主力失败以后，余部仍分散在鄂西北各地坚持斗争。其中一部分在武安堰受骗投诚的红巾军，回到庙滩再度起义，西上均州、房县、竹山，拟由竹山进入陕西。因为受到延绥镇总兵龙泽厚的阻击，退回均州孙家湾，最后于四月十五日聚集于武当山。

武当山绵亘数十里，山深林密，悬崖峭壁，十分险峻。红巾军余部占据武当山后，将山路砌断，准备恃险固守。唐训方等奉命驰往，合兵围剿。唐于四月二十九日抵达豆腐沟，截断红巾军退路；龙泽厚则扎营中观，唐蒸云扎营下观，吴佑棠、张兴邦驻于黄土垭。红巾军陷入敌人四面包围之中。五月初三（5月25日）五更，清军向红巾军发动仰攻，连破二卡、三卡。红巾军恃险抵抗，清军仰攻不能得手，坚持到夜深四更，红巾军想从中观方向突围，受到龙泽厚的伏击，战士被俘者达97名。其余的人知道无法突出重围，只得复返金顶。五月初四，清军派叛徒张兴邦上金顶诱骗起义军投降。初五（5月27日），起义军两百余人受骗走下武当山金顶向清军投降，全部惨遭清军杀害。红巾军起义最后失败了。

鄂西北红巾军起义从咸丰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爆发，到咸丰七年五月初五最后失败，前后转战于鄂西北各地达8个多月。这次起义虽然和历次农民起义一样，最后以失败告终，但他的意义仍然不容忽视。

首先，红巾军消灭了大批反动武装，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。红巾军起义后，第一着就摧毁了驻守竹条的巡检署；在兴隆大战中又打败了清军1万多人，攻打樊城，再使卢占春统领的精锐营1千人“全军覆没”。以后在各地作战中，屡次打败清军，杀死了大量清朝官兵。仅据胡林翼的奏报和各府县志记载，被红巾军打死的游击、千总、把总、团长、武举、兵勇、以及候补知县、贡生、监生等，总数即在3000以上。其外，如在闽兵营作战中，清兵被打死的填满一个坑^⑩。在夜明珠之战中，宜昌知府阮福与景辉率兵400抗拒，全部被歼^⑪。清军继受到太平军、捻军的沉重打击之后，又受到红巾军的打击，无疑起到了加速清朝统治崩溃的积极作用。

其次，摧毁大量设于鄂西北各地清政府的统治机构，严重削弱了清政府对鄂西北地区的统治。红巾军所到之地，除惩罚了一大批清朝反动官吏外，对于清政府设置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机构，亦愤怒加以摧毁。如谷城县，红巾军尽管占领后又自动撤出，而那里的县署、典史署、巡检署、湖北提督军门署、中营游击署、前营都司署、中营守备署、前营守备署等均全部被毁^⑫。其他各个城市，凡是被红巾军攻占的，其统治机构无不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被毁的总镇署、府署、州署、县署、典史署等共达50多个，文案等亦同时付之一炬。这虽然是一种自发反抗的表现，但不管怎样，对于清政府来说，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。

第三、起义对清政府经济上的打击也是沉重的。那时省城武昌控制在太平军手中。官文、胡林翼等组织清军反扑，急需大量军饷。鄂西北是军饷供应重地，湖北布政使马秀儒即长驻襄

阳,筹集粮饷。红巾军起义后,不但鄂西北地区粮饷无法筹措,胡林翼不得不奏请“一律展缓”^⑩,而且为镇压红巾军起义,又需增添军饷。同时,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在广大人民无粮可食引起,所以每到一城,城内储存的粮食(包括备荒的粮食)几乎全部征用。如谷城县常平仓,“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存谷 7700 石,咸丰六年清查无存”^⑪。光化“道光二十九年清查存谷 3700 石,咸丰六年被掠,清查无存”^⑫。房县存粮 1450 多石,焚掠无存^⑬。保康常平额谷 4000 石,“咸丰六年被掠,清查无存”^⑭。兴山县常平额谷和粟谷共 5000 石,“咸丰七年被掠无存”^⑮。东湖(宜昌)县存谷 7700 石,咸丰七年被掠无存。远安“常平额谷 8000 石,……咸丰七年被掠无存”^⑯。凡此等等,一方面表明此次起义与干旱缺粮有直接关系,另一方面对清政府的钱粮征收也带来极大的困难,以致胡林翼不得不向咸丰帝建议“一律展缓,以示体恤”。

最后,红巾军起义配合了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,对太平军、捻军是一个有力的声援。红巾军起义时,太平军和捻军正在长江中下游、淮河两岸与清军进行激烈较量。特别是武昌,太平军自从 1855 年 4 月 3 日三克武昌以后,清军即全力进行反扑,经过一年半的反复斗争,到红巾军起义时,双方斗争正进入最紧张阶段。由于红巾军起义于鄂西北,清廷十分害怕红巾军北上,形成燎原之势,不得不从武昌前线、河南、陕西、荆州等地抽调得力军队前去镇压,大大打乱了清政府的军事部署,造成“兵力稍薄,不及大举”^⑰,减少了坚守武昌城的太平军的压力,使武昌的太平军得以继续坚守到 1856 年 12 月 19 日。这对于太平军无疑起了重大的支援作用。

鄂西北红巾军起义的失败,再一次教育人们,农民由于本身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,起义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无法正确解决。因此,它再一次昭示: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,单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求得彻底解放的。在今天,农民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,和工人结成巩固联盟,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,才能求得彻底解放,为自己及子孙万代谋幸福。

注 释:

- ①⑮⑲⑳ 唐训方:《从征图记》,《捻军》资料丛刊Ⅲ,第 270、275、270、277 页。
- ②⑤⑥⑦⑧⑨⑳ 武大历史系、牛首高中联合调查组:《太平天国时期鄂西北红巾军起义资料汇编》,1975 年油印本,第 1、13-14、1-5、33-34、68 页。本文资料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书。
- ③ 赵尔巽:《清史稿》三八,中华书局 1977 年版,第 11733 页。
- ④ 武大历史系 71 级教学实践队:《南王八大家调查综合资料》(油印本)。
- ⑤⑫⑬⑭⑯⑳㉑ 胡林翼:《胡文忠公全集》,上海广益书局 1935 年版第 4 册,第 257、243、294 页;第 3 册,第 189 页;第 1 册,第 135、131、155、135 页。
- ⑩⑳ 王万芳等:《襄阳府志》卷 10,第 7 页;卷 16,第 41 页。
- ⑪ 均县武当山中观道士庞高城口述,笔者 1976 年 8 月 22 日访问记录。
- ⑫ 崔淦等:《襄阳县志》卷 4,第 62 页。 ⑬⑭⑮⑯⑰⑱ 张仲灿等:《湖北通志》卷 72;卷 48。
- ⑲ 方玉润:《星烈日记》,丙辰(1856)十月初九日。 ⑳ 陈宝琛等:《文宗实录》卷 208,第 13~14 页。
- ㉑ 本节以上日程参考了 1987 年 7 月 15 日卓坤老师来信。卓老师曾于 1983 年赴北京明清档案馆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。
- ㉒ 尹耕云:《豫军纪略》卷 3,《捻军》资料丛刊Ⅱ,第 202 页。 ㉓ 《湘军记》卷 3,第 26 页。
- ㉔⑳ 《谷城县志》卷 2,第 1-3 页;卷 48,第 22 页。 ㉕ 《平定粤匪记略》卷 5,第 20 页。

(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)